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 新时期工人状况的社会学鸟瞰

劳工作为生产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作为阶级问题,曾经是世界性的重要议题,当然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思考的重要学术问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经典理论。在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渐呈消退趋势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劳工群体却以其独特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大军,不仅因其数量巨大而且以其令人悲叹的生存状况与特有的抗争方式而引人注目。



■郭于华

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为标志的“世界工厂”形象伴随着中国庞大的劳工群体,出现在新经济的舞台上。但是这一出现并非一个新工人阶级的闪亮登场,而是以工人的被非法欠薪和艰难讨薪、罹患尘肺等职业病或工伤而得不到合理赔偿与诊断救治,甚至是青年工人屡发跳楼自杀等现象而黯然呈现;而这一切的底色便是资本与权力勾连的“中国特色”。劳工作为生产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作为阶级问题,曾经是世界性的重要议题,当然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思考的重要学术问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经典理论。在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渐呈消退趋势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的劳工群体却以其独特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大军,不仅因其数量巨大而且以其令人悲叹的生存状况与特有的抗争方式而引人注目。

一、经典理论不曾面临的问题

中国工人阶级的退场与再形成是伴随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社会事实”。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到今天已然成为劳工主体的“农民工”群体,面对中国社会重大而紧迫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有必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6)

有关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研究论著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资源。然而这些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典理论面对今天的中国农民工问题都难以提供现成的解释,或者我们可以说经典理论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在21世纪的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劳工群体也正在形成之中。其构成通常被认为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农民进城被镇为工成为工人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原有国企工人转变而成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和因制度转轨而失业下岗的工人。而作为农民工第二代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以其相对于他们父辈的鲜明特点而跨进劳动力市场。这些特点决不仅来自于年龄的差异,而是全面呈现出“新生代”作为一种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资本和国家所具有的不完全相同于上一代的关系类型;而这决定了他们在行为、表达、动机和观念方面的明显特征。具体而言,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有相当比例的人是直接从学校进入工厂;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联系相对薄弱,务农经历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务农经历;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更强,消费习惯、生活追求和价值观念和以“农村”为根的父辈大相径庭;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也有较大的变化,他们的权利意识更强,对社会不公更为敏感;他们会主动与企业争取利益、向国家要求权利。与城乡、企业、国家的新关系界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新

生代的群体特征也导致了他们在权利表达上的新特点,这不仅表现为年轻人更频繁地发动和广泛参与各种抗争行动,而且还表现在其斗争策略、动员手法、与社会各界互动方式等的转变上,特别是他们的利益诉求的变化和提升等方面。例如,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行业利润,要求分享更多的劳动成果,维权诉求转变为利益诉求;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组织或建立的制度障碍,从而强烈要求重组或建立企业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3)

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遇“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

1. 工资问题。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分析了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为它的转化形式,即表现为工资的。作为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物的工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根据劳动力生产费用和供求关系而形成的。但无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只不过以工资形式得以掩饰(马克思,1975:585—593)。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分析,马克思力图揭示资本如何靠榨取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而获得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1975:258—271)。然而马克思试图用以解释资本家是如何通过工资形式及剩余劳动时间获取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今日的中国农民工、特别是建筑业农民工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是低工资的问题,也不仅是劳动时间的问题,而是不能“按月结算”领取工资、甚至干满一年都拿不到工钱的问题。从2013年调研总体样本来看,工地上按月结算工资的比例仅为19.9%,不足1/5。成都市和沈阳市“按月结算”的比例较高,而首都北京的比例最低,仅为5.5%。在过去的一年中,未经讨薪而结清工钱的比例为46.6%,其中郑州市比例最低。此外,有12%的工人没有拿到一分工钱。可见,建筑业拖欠工资的现象依然严重(潘毅,吴琼文倩,2013)。值得注意的是,拖欠工程款导致工人无法按时领取劳动报酬的不仅是资方,还时常是政府项目。这类欠薪问题是经典的劳工研究理论也不曾面临的。

2. 劳动力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劳动者完成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那部分时间,包括劳动者自身劳动能力的恢复和持续;劳动技能的培养和提升;新的劳动力的补充和增加等。由此不难得知,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仅包括了工人本身的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而且还应扩及他们的家庭,包括他们的医疗、社保、住宅、子女哺育、教育、老人赡养等费用。但中国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背井离乡,只身来到城镇工作,其得到的常常是最低工资收入水平的报酬,只包括了他们自身最低资本再生产的费用,并不足以覆盖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成本;更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所限,他们无法作为移民工人真正置身于他们所向往的城市,而是往来于城乡之间,形成了每年春节期间

候鸟迁徙般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3. 劳动力供给问题。根据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经济理论,如果劳动力短缺情形出现,可能成为迫使资本提升工人工资、改善劳动待遇的契机,但是在中国,比如东南沿海地区曾经出现的“民工荒”,却并未迫使资本提升工资和待遇,也并未带来工人处境的改变或者有利于工人的改善。这仅仅用劳动力供求关系理论无从解释,其原因当从“中国特色”中寻找。

4. 阶级斗争与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现实告诉我们,无论是马克思的以“生产”为中心环节,在生产过程中的结构位置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剥削本质,导致工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分析(马克思,1961),还是将“市场”置于核心的自我保护理论将会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再次勃兴而达到高峰的波兰尼模式(卡尔·波兰尼,2007),抑或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更多地强调生产过程以外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价值观对工人阶级形成的作用(汤普森,2001),都无法直接用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开放三十多年了,为什么未见工人阶级的形成,或者工人任何形式的组织化过程?为什么富士康的青年工人选择跳楼自杀都不进行积极的表达与抗争?工人的各类抗争行动为什么经常无效?在工人遭遇困境之时,工会在哪里?工会又在做什么?总而言之,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二、“中国特色”:权力与资本的独特结盟方式

回答上述问题,须具有社会结构性视角,即从作为结构力量的权力、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与互动入手,方能看到中国劳工问题的本质。劳资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是经济活动中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少有国家和地区达到中国大陆的程度:一方超强,力量、能力和资源占有等方面非常悬殊,致使协商、谈判、对抗等博弈过程无从进行,甚至博弈一词用在此处都显得过于奢侈。我们需要分析不同力量之间何以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劳工为何如此之弱,资本为何可以如此强大和蛮横,其力量和资源来自何处。

1. 工厂专制政体下的管理模式
麦克·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一书中提出并且系统地论述了“工厂政体”。根据他的界定,“工厂政体”包括了对工厂和劳工进行分析的四个基本维度:第一,劳动过程;第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第三,市场竞争;以及第四,国家干预(Burawoy, 1985)。这四个环节把微观的工厂场景与宏观的制度背景勾连起来,它们共同作用,塑造了劳资关系的基本特点以及工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能力。这些基本的政体维度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劳工问题提供概念和理论借鉴。

以工厂专制政体的概念工具透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农民工的抗争方式,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新生代农民

工群体就业的大多数工厂政体都属于典型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可以发生多起跳楼自杀事件的富士康工厂作为代表,而远未达到“制造甘愿”的霸权政体的阶段。不加掩饰地压迫和剥削是资本治理农民工的主要方式(Burawoy, 1985:5; Lee, 2007; 沈原,2007:164—165)。

准军事管理体制下的车间管理模式与宿舍管理模式是工厂专制政体的突出表现。以富士康工厂为例,堪称“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至少具有四个主要显著特点:第一,高强度的劳动过程、超长劳动时间和低廉的工资;第二,工人宿舍位于厂区之内,成为车间专制政体的延伸;第三,除生产线上的工作关系外,工人之间的其他社会组结几乎全部被破坏,从而造成工人孤独冷漠的原子化状态;第四,准军事化的非人道管理(郭于华等,2011)。

2010年10月发布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分析探讨了富士康的劳动管理体制,即以高强度、超时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成本来达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暴力规训、意识灌输及分化工人来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牺牲工人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管理模式。在富士康,工厂饭堂与宿舍等生活区,甚至工厂以外的社区,都只不过是生产车间的延续,是工厂低成本运作的体现,都被牢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国版图之内。这种生产车间与宿舍管理紧密结合的工厂体制构成了庞大的、中国所特有的宿舍劳动体制。这也是“富士康帝国”存在的秘诀,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规训着工人的肉体与精神,塑造着工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工人进行24小时“全景敞开式”的控制,其管理体制造成直接的暴力伤害和集体性心理创伤。这种极为严苛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导致的结果是,工人不仅被商品化了,而且更被原子化了。原子化的工人被剥夺了采取集体行动的各种资源,只能采取消极的表达与反抗方式,自杀则是选择用生命来表达无声的、也是最绝望的反抗(“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2010;2012)。

我们必须意识到,富士康这类劳动管理体制的形成不仅是富士康企业本身的“杰作”,更离不开跨国资本与权力的“支持”力量。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该政策通过维持劳动力的低工资和低权益,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富士康企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了快速成长;而与此同时,跨国资本的获利本性和运作逻辑将富士康置于利益链条的末端,只对其支付最低廉的代工费,使这类“代工帝国”为了获取微薄的利润转而更残酷地压榨工人,可以看出是跨国资本、权力和代工企业联手将工人迫入悲惨的境地。

2. “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维持”(maintenance)和“更新”(renewal)两部分。前者指的是劳动者恢复体力脑力的过程,而后者则包括一系列劳动力代际更替的安排,如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一般而言,劳动力的维持和更新两部分应紧密结合,在同一时空条件和相同的制度背景中进行。然而在我国,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却被拆开了。农民工个人体力脑力的恢复是在工厂/城镇中实现的,尽管这往往只是以拥挤的住所和粗劣的伙食为特征的劳动力低水平“维持”。而劳动力的代际“更新”则是在这些农民工的来源地即乡村老家中实现的。具体来说,农民工的父老子女留在了生活成本较低的农村,成为“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农民工家庭中的老人赡养和子女抚育也仍然需要部分依靠农业生产来实现。将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老子女分开,不但可以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以廉价劳动力来推进工业化,而且可以减少城市的负担和压力。也就是说,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和代际更替被拆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不同空间中进行,而被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化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这种拆分体制。低工资收入、低社会保障、城市—农村双向依赖、强迫流动等构成其主要特征(清华大学社会学

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3)。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给农民工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导致了农村社区空心化和凋敝的趋势,但却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为目标的资本所偏好,也被发展主义取向的国家所青睐。

“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这种再生产模式确保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过去的三十年内将全球范围内迅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过来,推动中国迅速转变为“世界工厂”。国家则通过一系列规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户籍身份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对劳工集体组织争议权利的约束等延续和固化了这种模式。

3. 政府帮企业解决用工短缺问题
通常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失衡会带来劳动力的变化与相应调整,企业用工量很大而工人相对不足的时候,本应是有利于工人提升自身价码、改善待遇的机会,也是企业产业技术升级的契机。然而,在中国东南沿海等部分地方已经出现“民工荒”的时候,这种机会和契机却并没有出现。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并以行政手段帮助企业招工。

解决用工短缺的一个主要作法是政府将招工作为重要任务,将招工指标分层下派,为此甚至不惜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为招工企业服务。例如,在河南省,政府将富士康的用工需求作为招工指标进行分解,层层下达给各级政府作为重要的任务,并且在财政上给予大量补贴。2010年9月,河南省政府下发题为《河南省扶贫办关于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我省贫困地区招聘培训员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以扶贫的名义将为富士康招工的任务下达给各地方政府,该文件显示当年的9月、10两个月内为富士康完成招工人数2万人,招募对象主要为职业学校在校的实习生以及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为了完成招工任务,该文件还规定了招工的奖励措施,其中职业介绍补贴为每人200元发放给职业介绍机构,就业人员每人给予600元生活补贴,同时省政府还对奖励人员到富士康工作和实习的学历给予奖励,仅前两项补贴合计就高达1600万元。在河南安阳,广西南宁,重庆、成都等富士康新建厂区,调查也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2010;2012)。地方政府以促进就业、实习、扶贫等名义,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其目的不过是配合招商引资,为富士康的投资落户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下转04版)



美联储对加息时机存在分歧

在最近一次会议上,美联储(Fed)政策制定者围绕开始加息的适当时机分成了几派。部分人倡议早在6月份就开始采取加息措施,而其他人则建议等到今年底,甚至到2016年再加息。

日前议息会议的会议纪要指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几名”成员认为,考虑到经济前景已经改善,预计6月份加息举措的时机就会成熟。然而,其他人却预计能源价格下跌以及美元走强会压低通胀,从而迫使他们将首次加息时间推迟至今年底。还有两名成员则提议等到2016年再加息。在这次会议中,FOMC指出美国就业市场出现了“普遍”改善。

这次分歧凸显出,在疲软的一季度增长数字及低通胀出现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力度依然存在不确定性。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是在近日的薪资支付数据公布之前,而低于预期的薪酬数据则令局面更加复杂。

纽约联储主席比尔·达德利(Bill Dudley)曾表示,由于疲软的就业和增长数据,6月份加息的门槛已经提高。不过他坚称他并未排除6月加息的可能。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威尼(James Sweney)最近将加息预期从6月份推迟到了9月份。他说:“他们释放出的信号是,加息虽不会马上发生,但在今年推出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在这一会议纪要发布之后,美国国债价格立刻面临下行压力。与此同时,股市出现下滑,美元汇率出现反弹。对利率预期变动最敏感的两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攀升了一个基点达到0.53%。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上涨了1个基点,略低于1.9%。

与会者放弃了在加息前要“耐心”的承诺,此举得到了几乎所有FOMC成员的支持。这一决定为今年采取加息举措创造了可能。不过,FOMC的成员们还下调了对增长、通胀和利率的预期。此举促使交易员们猜测,6月份采取加息举措的可能性已经降低。(FT中文网)

热视角

瑞士政府成为有史以来首个以负利率发行基准十年期国债的政府。物价下滑和全球各大央行的空前举措正让全球市场进一步踏入未知领域。

瑞士率先以负利率发行长期国债

才能得到偿还,而此次发行轻松地获得了投资者的数倍认购。

投资者蜂拥买入欧洲债券是全球通胀下滑的结果。通胀下滑让投资者更容易接受负收益率债券,因为他们预计未来物价上涨将较为缓慢。政策制定者通过降息和出台资产购买项目来应对物价下跌。3月,欧洲央行(ECB)购买了525亿欧元的政府债券,作为其

1.1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项目的一部分。今年1月份,由于预期欧洲央行宣布全面的量化宽松措施,瑞士央行(SNB)将存款利率下调至-0.75%,同时放弃维持瑞士法郎对欧元的汇率上限。

美联储(Fed)在2015年继续考虑加息,但一些投资者认为,自年初以来的疲弱经济活动可能让政策制定者们更加谨慎。与此同时,

日本央行(BoJ)依然处于宽松模式。

汇丰(HSBC)的全球固定收益研究主管史蒂文·梅杰(Steven Major)表示:“现在央行出台了非传统的政策,因此你不得不预计非传统的后果。一个后果是,债券不再像债券,它们现在像大宗商品,投资者对价格进行投机。”(FT中文网)



负收益率债券成为全球增长最为迅速的资产类别之一,大约占到欧洲政府债券市场的1/4。在过去一年里,德国、奥地利、芬兰和西班牙全都以负收益率发行了期限较短的债券。但这是投资者首次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借钱给一国政府,同时还倒贴利息。他们以-0.055%的收益率购买了2.3251亿瑞士法郎(合2.413亿美元)的瑞士国债,直至2025年